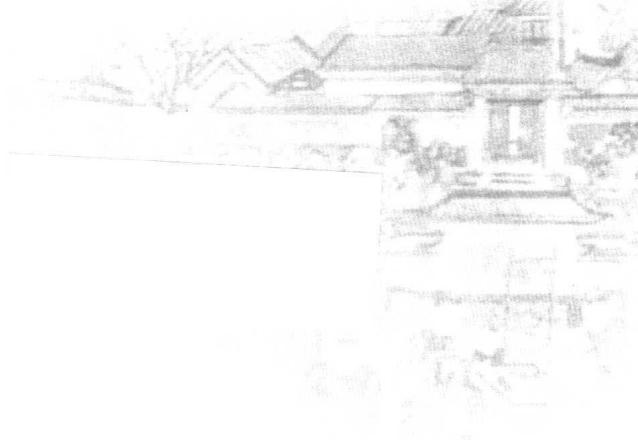


新 生 代 学 人 文 丛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余新忠 著

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



代 学 人 文 丛

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余新忠 著

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

中国 人民 大学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 /余新忠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新生代学人文丛)

ISBN 7-300-04361-5/D·739

I . 清…

II . 余…

III . ①瘟疫·研究·华东地区·清代 ②瘟疫·社会问题·研究·华东地区·清代

IV . ①R254.3 ②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3539 号

新生代学人文丛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

余新忠 著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编 100080)

邮购部：62515351 门市部：62514148

总编室：62511242 出版部：62511239

本社网址：www.crup.com.cn

人大教研网：www.ttr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14.375 插页 3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57 000

定价：2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策划人语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学术性出版机构，深知自己在知识积累、文明传承、理论创新、资政育人和服务社会中的神圣职责，因而一直将出版原创性的学术著作视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和责无旁贷之事。为发现人才，奖掖后学，推动学术进步，促进理论创新，繁荣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我们决定遴选我国中青年学者的优秀学术著作，编辑出版《新生代学人文丛》。

《新生代学人文丛》立意在“三新”。

一是“新学人”。文丛的作者限定在中青年，尤其是年青一代。年轻意味着朝气、锐气和创造力。年轻人思维敏捷，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承载着学术发展的希望。他们需要前辈的点拨，更需要出版界提供话语机会。本文丛将为杰出的年轻学人提供崭露头角的舞台。

二是“新作品”。文丛要求入选著作对文史哲诸人文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或重大前沿问题，从独特视角或新的层面，提出学理上能够成立的独到见解，尤其属于具有交叉性、前沿性和新方法、新观念的原创性学术专著。

三是“新机制”。文丛借鉴国外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实行专家双向匿名审稿制，意在以学术水平为终极标准，借助专家的慧眼，挑选出真正有价值的、对学术发展有所贡献的著作。

我们把编辑出版“新生代学人文丛”当做一项长远的事业。当今天成为昨天，进而成为遥远记忆中的片断之时，如果后人在做相关专业学术史的追溯时，本文丛的入选著作能够成为不可绕过的一环，我们的目的和愿望则庶几达成矣。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学术专著，从书名上看，同传统的史学研究异趣，我们几乎要将她打入另类，但如果打开书页翻一翻，就会发现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著作，甚至同我们的身体健康颇有关系，笔者就是为书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所吸引，饶有兴趣地阅读的。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以下简称《瘟疫与社会》）一书，对清朝时期江南地区（含苏南、浙西、浙东）瘟疫流行的状况、社会与政府的对策及其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关系，做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

《瘟疫与社会》的作者，将占有的大量资料进行爬梳整理，对江南的疫情做出特征性的说明：在时间上，逐渐呈递升态势；空间上，集中在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稠密、社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瘟疫种类，以霍乱、伤寒、痢疾等肠胃道传染病为主，嘉庆道光之际真性霍乱从外国传入，反映出

序 一

瘟疫国际化的趋势；传播途径上，水传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伤害力方面，瘟疫频数增多，而杀伤力有所减弱；社会影响方面，主要体现在心态、风俗信仰上；至于疫病产生的原因，指出天灾是必要的诱因，而人口则是影响瘟疫分布最为关键的因素。

说到瘟疫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瘟疫与社会》通过分析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和地区社会力量对疫情的防预、控制的作用，认为两者需要合作与互补，而不是社会力量同政府的对立；同时强调起重要作用的是社会力量，反映出清代江南社会力量、社会组织的强大，社会经济的发达，体现了江南社会的活力和特质。论及江南防疫能力的进展，作者没有盲目套用西方理论，而是认为它是以中国的方式发展变化，虽然也受到西方的某种影响，但其主体是江南社会自身孕育出来的。

对于瘟疫及其流行情况，我们注目的种类、地域、传播途径、伤害力、产生原因、疫情防控诸方面，读罢全书，掩卷回思，历历在目，可见作者研究透彻，从而给读者以清晰的回答和明确的概念。

《瘟疫与社会》论题新颖，基本上为前人所未涉猎。其所研究的对象是危害人们健康与生命的瘟疫，并且不仅论述疾病本身，更重要的是说明瘟疫流行的后果和社会对它的控制。过往医学史界大多关注疾病本身，而忽视疾病与社会的关系，历史学界对这种历史领域不好说全然漠视，然也可供叙述的成果微少。《瘟疫与社会》研究的领域，属于“人群生命史”的范畴，这门学问产生于晚近，在西方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台湾学术界则进行了十多年的研究，出现“疾病、医疗与文化”研究小组，稍晚亦引起祖国大陆学者的关注，不过起步之始认识上不是那么自觉。因为它是新兴起的，名称尚难取得学者的共识，诸如“身体史”、“医疗社会史”、“疾病医疗社会史”之类。在我们对“医疗社会

史”尚属陌生的情形下，五六年前，余新忠博士以其学术目光的敏锐性踏进这一学术领域，两年多前撰成《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似乎是我国内地医疗社会史研究有自觉意识进行的第一部有分量的专著。在这一研究尚属于起步阶段的时候，余博士以其专著投入，与国内外同行共创具有新方向研究意义的医疗社会史乃至身体史研究，表现出创新的勇气，令人钦佩。

人群生命史，关注生命，关怀人生，自具其特殊价值。《瘟疫与社会》论述瘟疫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给予人们相关知识，可供现实社会的防疫卫生工作参考，其社会价值自不待言。

新方向的研究必须有充实的史料来支持。《瘟疫与社会》一书资料翔实，由书中的那些图表可知，笔者所言不虚。古代统治者认为瘟疫是圣明之世所不应有的现象，对之颇为忌讳，一般不予记录，即使载笔，亦语焉不详，因之留下的资料很少，而且零散。《瘟疫与社会》的作者挖掘医书、档案、方志、文集、笔记、政书、族谱等所载的资料，搜集相当丰富，能够成功地说明清代江南瘟疫流行的状况和社会对策，并对原始资料做出特别的介绍，不仅是著作完整性的需要，对后来的研究者也有触类旁通的参考价值。

史学工作者要写与医学有关的医疗社会史专著，会遇到先天性的困难，即医学知识的不足。就笔者所知，余博士为进行他的研究，投入相当的精力，做了相关知识的补充，为很好地完成专著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医疗社会史，是跨学科研究领域，史学背景出身的学者，必须增加医学知识，才能介入这种研究。我想，余博士以其史学和必要的医学知识的准备，所著述的《瘟疫与社会》，可能会得到医史学界的认可。

最后我想说，《瘟疫与社会》是我国大陆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新兴的医疗社会史及身体史研究是对人生

的关怀，相信会越来越有前途，余博士可谓开了个好头。余博士年轻，学术思想敏锐，视野开阔，勤奋钻研，必会有新的研究成果贡献给学术界和社会。我们以此期待于他，是以乐于写此序文。

冯尔康

2002年8月22日于南开大学顾真斋

余新忠博士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可说是非主流的历史研究。虽然论文引用了大量主流史学研究常引用的资料，如方志、文集等，但由于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比较注重政治、制度与上层学术思想等，一般人对历史这门学问的了解也多局限于此，所以在主题上，或许让读者觉得不属主流。

然而，主流与非主流史学之间的界限，在今天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里似乎已渐松动。其实这个变化在欧洲的史学界早已发生。西方史学者对日常生活、寻常百姓的生命历程等的历史已关注了数十年之久，在今天，这类史学已毫无疑问地成为西方的主流。虽然传统的政治史、事件史并没有因而完全消失，而以所谓“新的旧史学”（意指重新解释的政治或大事件、大人物的历史）从新出发，但是政治史并没有再度成为惟一的历史研究主流。或许，当社会真正关注人的具

体生命与生活的种种复杂问题时，就不会再把所有的精力与兴趣投注在传统定义下的政治权力或抽象的思想上面。其实，只有多方面地探讨人的历史，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我们的过去与现在。

余新忠是大陆新一代的优秀史学工作者。我在 2000 年秋访问南开大学时与他初次见面，并读到他刚完成的博士论文，也与他讨论了不少有关疾病史的问题。我深深感受到他对研究的热诚，并佩服他能在不甚有利的客观条件下，短短三年内完成内容如此丰富的论文。同时他的论文让我意识到大陆史学研究与国际史学研究的趋势接轨日趋密切，这是令人感到兴奋的发展。我当时估计，余新忠的论文必然会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果然不出所料，两年后，欣闻此论文被评为 2002 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并正式出版，实在替新忠感到高兴。当新忠要我为此书写序时，我义不容辞地马上答应，除了感到荣幸外，也觉得有义务鼓励更多年轻的学者加入研究疫疾社会史及其他相关领域的行列。

其实新忠选择了一个非主流的社会史题目不令人惊讶。他的导师冯尔康教授是史学界的前辈，并很早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有兴趣，且不遗余力地介绍、推广社会史，新忠受到启发勇敢地走入新领域，是件自然的事。我一向极景仰冯教授的学问，更敬佩他宽阔的眼界及对后辈的提携。新忠能得到他的指导是幸运的。当然，新忠本身的天资与努力仍是论文成功的主要因素。

新忠的论文主题是一个很重要但同时困难度颇高的课题。无论在资料运用上、专业知识方面还是现象的解释上都相当不容易把握。

首先是资料方面。传统中国社会除了有关国家财政收支、人事等问题比较注重数字的记录外，其他方面的数据都不甚求精确。尤其不易找到可靠的地方性数据资料。这个资料方面的困难，是所有中国社会史学者都必须面对的。这与

研究西方近代社会史的学者可利用丰富的教区或地籍资料写出精彩详细的地方史^① 不能相比。事实上，新忠将研究集中在江南地区的主因之一就是这个区域的资料相对之下还比较丰富，但就算如是，他仍必须以迂回的方式解释某些现象以补资料上的不足。

其次是有关疫疾的性质方面。明清史料所提供的有关疫疾的资料，如病症、死亡率等往往让受了西方近代医学洗礼的现代人感到匪夷所思。到底史书所载的各种疫疾所指何疾？相信就算是医学专家也难以完全确定。这些限制，加深了解释的困难。如以下这个简单的问题，就无法有圆满的答案：从文献看来，清代江南瘟疫较别处频繁，而江南以外地区，如岭南或其他地区疫情却较少。但这到底是由于江南的资料比较详细、江南的医生比较多，故有较多疫疾的纪录；还是因为江南疫情确较别处为严重？令人不禁怀疑这到底是否主要为资料性质的问题。同时，史籍所载的瘟疫种类是否只独见于江南？这类的问题，既困难又有趣，仍待学者进一步探讨。

但无论如何（尽管困难重重），新忠已成功地为清代江南疫疾的社会史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描述。他利用了大量江南地区的各类资料，合理地解释了多次疫情发生的经过、分布情形与死亡率的影响。他的成就在于相当具说服力地将清代江南疫灾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呈现出来，特别在对社会的影响及社会应对能力的估计方面，有中肯的看法。在清代江南社会史这个复杂的拼图中，新忠放进了重要的一块，让后来者能有依据地把其他的部分填补上去。或者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比较全面的图画。

^① 如著名法国史学家勒华拉杜里（Le Roy Ladurie）的名著之一《朗格多克的农民》（*Les paysans de Languedoc*, 1969）就是利用法国南部地区大量详细的地籍资料 *compoix* 写成。

医疗社会史方面的研究，台湾学者起步比祖国大陆学者要早，也已成为了主流史学的部分。这是由于台湾学术界近二十年来较直接受西方史学的影响。事实上这个领域颇广阔，每个研究者的兴趣无论在主题上、时段上均各有发挥。但是台湾学者较无法处理的问题，是比较细部的地方史方面的探讨（台湾史除外）。这当然是由于资料的限制。然而西方的社会史研究已进入相当细微的探讨。中国史这方面的发展，恐怕必须依赖如新忠一样的内地年轻学者。相信各地可就地取材的非文本资料不少，加上所藏的仍未出版甚至仍未编目的地方史料颇多，有待学者去发掘、利用。内地年轻学者乘地利之便，相信可以写出更多更精彩的地方社会史。在这方面，新忠无疑已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梁其姿

2002年9月26日于台北南港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清代江南瘟疫的生态社会背景	46
	第一节 生态背景	47
	第二节 社会背景	49
	第三节 疫病医疗背景	60
第三章	清代江南的疫情	64
	第一节 关于疫情年表	64
	第二节 疫情的时空分布	66
	第三节 瘟疫的种类	79
第四章	清代江南对瘟疫之认识	120
	第一节 病原	121
	第二节 病因	133
	第三节 传染方式	144
	第四节 晚清西方细菌学说的传入	152

1

目

录

	第五节 小结	154
第五章	清代江南瘟疫成因探析	159
	第一节 成因探析	160
	第二节 余论	184
第六章	清代江南瘟疫与社会之互动	186
	第一节 时人的卫生防疫观念和行为	186
	第二节 各界救疗瘟疫之举措	249
	第三节 医学与瘟疫	288
	第四节 瘟疫的社会影响	315
第七章	结语	340
附 录	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	355
	参考文献	393
	重要人名和术语索引	429
	后 记	443

第一章

绪 论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战争、灾荒、疾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虽然今天已难以复原和尽述它们对人类的肆虐，不过对其在历史上的重大影响却多少可以想见。对于战争，史学家从来不缺乏重视^①；而灾荒，近年来也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著作的论题；反倒是一些实际上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疾病，成了历史学家的漏网之鱼。在历史教科书中，不用说疾病，就是医疗技术，也只是极其简略地一笔带过。事实上，疾病，特别是其中危害重大的传染病，不仅在历史上给人类文明的发展制造了种种屏障和灾难，就是在今天，仍有肺结核、疟疾、麻疹、痢疾、艾滋病和像肺炎和流感之类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等六种传染病依

^① 当然，应该指出，这种重视主要是因为它与重大政治事件的直接挂钩，从社会及社会心理等方面探索战争影响的研究目前依然比较缺乏。

然威胁着全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与生命。最近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称：“全世界每小时有1500人死于传染性疾病，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和具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可以通过预防手段避免死亡，所需用的代价比购买几瓶阿司匹林所花的费用还要少。”^① 显而易见，对历史上疾疫的探索，不仅有利于更准确地理解历史，而且还将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现实。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的国家，无论是疫病对我们祖先的侵害还是祖先对疫病的斗争，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从社会史的角度勾勒出中国疾病、医疗的发展轨迹，除了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自己，也必将成为更好地理解世界文明进程的重要一环。在这样的背景意识指引下，本书选择清代江南作为自己的探讨对象，以期对历史上瘟疫的流行状况以及瘟疫与社会的互动有所揭示和呈现。

一、选题缘起

对这一课题的最初兴趣是在资料的阅读中产生的。近些年来，我一直从事明清江南区域社会史、特别是清代江南社会救济史的学习和研究。在此过程中，我翻阅了不少有关清代江南的方志、文集和笔记，资料中偶尔出现的有关瘟疫的记载逐渐引起了我朦胧的关注。我开始感到，在当时的史志中，瘟疫均和水旱等灾害一起归在“灾异”或“祥异”这样的条目下，既然同属灾异，为什么在灾荒史和社会救济史的研究中，人们总是较多地关注水、旱、虫等天灾，而很少注意到疫灾？稍做探索便发现，

^① 美联社电讯：《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六大传染病威胁全人类》，载《参考消息》，1999-06-19，第7版。